



“70后”作家徐则臣一直经营着他的“进城文学”，他对城市中各色人等，特别是对底层小人物的刻画已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新作《王城如海》在延续以往平民意识的同时，更是聚焦于城市知识分子的心灵忏悔这一极具深度的主题，读来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的确，没有比惊心动魄一词更能形容我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体验。我们看到，靠着自身努力而成功“进城”的知识分子为此付出的代价竟是如此的令人发指，城市中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背后原来蛰伏着无数罪恶的灵魂。不仅如此，《王城如海》还涵盖了不止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诸如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伦理焦虑。这些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原本就令人触目惊心，而作家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当下火热的现实中去，以现实主义的风格完成了他对形形色色的城市风物的考究。

《王城如海》的主人公余松坡是一位留洋归来的先锋派戏剧导演。围绕余松坡的遭遇所牵连出的故事线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之一。他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引发的争议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剧中涉及的蚁族问题，媒体们纷纷围绕这部戏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口诛笔伐。此外，最令余松坡揪心的还是他的堂哥余佳山。他深知余佳山的悲剧是自己亲手写的检举信造成的。尽管真相无人知晓，但自己的那一关怎么也过不去，这几乎成了余松坡永远的隐痛。“也许如此无限地放大没有意义，但一想到我曾在浩大的历史中对一个人伸出卑劣的告密之手，我就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余松坡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所悔恨的正是自己“将一个无辜者送进了监狱”，而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一直折磨着余松坡的身心，让他不得安宁。不妨说，余松坡以一个忏悔者的形象出现，从而传达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内在

百家品书

生命体验与文本世界的对话

金春平

对于梁静来说，曾经从事小说与散文的创作经验、业余性地 进行文学批评的身份体验，消费时代女性角色和社会处境的生命困感等等，都化为她进行文学批评乃至文化批评的话语资源——话语场域的边缘、理想情怀的晦暗、自我走向的探索，这些共同形塑着她的文学批评路径，而她集中于思考女权主义、时代症候、文化跨界等领域的中国化、本土化、日常化的实践问题，由此确立和延续为她的批评话语基石，而在批评风格方面，梁静的文化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分析阐释趣味。

首先是强烈的分析冲动和言说趣味。梁静的文学批评兼及艺术批评，尽量逃避学科化的专业术语——那些或陌生或冗长或奇异的词汇总是让人望而生畏，更未事先设定理论框架，将艺术文本削足适履的作为印象式、模糊性乃至想象性论点的注脚；相反，她对文学文本、影视作品乃至文化现象的分析，总是循着观赏者——游历者——反刍者——超越者的心理思维逻辑，直至将批评效果编织为言说的黑洞——那种源于大众的生活思考和文化浸淫却又普遍难以自知的言说觉醒。无论是涉及文学文本还是影视文本，梁静的文学批评总是带着强烈质疑和问题意识，以反叛者的姿态遵着时代语境——个人经验——文本呈现——理性思考的思路全面涌入，这样的批评资源和方式，在保证批评背景具有一定的时代广阔度和历史纵深度的同时，更实现了批评作家（作品）的“对话”。

其次是女权主义的价值实践。梁静的文学批评最鲜明的价值标准是女权主义——一种混合着性别民主、个体压抑、生命体验的文学标准。她的文学批评对象大量关注国内外的女性作家和女性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在批评言说当中同样将重心置于各类女性的命运挣扎和生命疼痛，甚至在一些批评判断中将主人公是否表现出女权主义和女权独立作为作品成败的标志。梁静自称对女权主义价值理论有着特殊的偏爱，同时她的这种将女权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在我看来也有可商榷之处，而“诗无法达”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给文学的高下优劣下一个绝对公认的标准是徒劳的，但是梁静这种对女性作家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实践的“偏执”背后，是她生命体验的一种投射——她是借用对女性作家和女权主义的批评表达着她的生活经验和心灵探索，这是对女权主义生成根源的遥相呼应，而非将之仅仅作为一个批评理论武器。在看似倔强的批评姿态背后，是一位有着多重生活思考经验的女性批评家。

再次是批评文体的自由跨界。梁静批评文本的自由跨界，有着文化散文的理性与思索、史料与纵论，也有抒情散文的自白与宣言、感悟与情绪，既有着小说叙事的策略与技巧，也有着理论剖析的客观与冷酷。梁静是将批评文本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学作品在进行创作，而她作为批评主体的在场，让其扮演着批评文本空间的引路人，让阅读者在自由漫行和驻足观望中，寻找着文学世界隐藏的密匙，打开一幅幅奇异诡谲的景观之门。无论这种文本景观的旅行是长途跋涉还是短途观光，“完整性”成为她进行文本批评的一种整体思维——批评文本的高度浓缩的信息、精湛明了的评论、贴切恰当的佐证、饱满充沛的激情，都使梁静的批评文本具有了散文的诗意和论辩的理性，在可读、深度、广度方面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度融合，也成就了其独特的批评文体和风格，梁静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风格的批评空间，并且充满着无数的可能和方向，我们期待着她能将这条路走到极致的完美！

（《唤醒批评》，梁静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反省和批判，表现为道德的重负和自律。不过，作家之所以写余松坡显然不是为了做简单的道德评判。相反，作家倾注于主人公身上的，更多是同情，而非谴责。像余松坡这样一个出身农村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成功”进入到城市已属不易。他一方面享受着“成功者”的待遇：住豪华别墅、开豪华汽车、有保姆伺候、衣食无忧；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城市带给他的不安：戏剧引发的争议、无暇享受家庭的温暖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告密者带给他的罪恶感。而这一切何尝不是一个“成功进城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呢？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要从余松坡家的保姆罗冬雨讲起。罗冬雨同样是农村出生的女孩，同样是来到北京打工，她一面与余松坡的家庭相连，一面和她的男友韩山和弟

知识分子的心灵忏悔及城市启示录

杨毅

弟罗龙河相连。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罗冬雨展现出的北京风物的另一面，也是更为广阔的一面，那就是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

小说中的罗冬雨、罗龙河、韩山、卡卡、鹿茜等人同样是在北京打拼的异乡人。做保姆的罗冬雨，她的大学生弟弟罗龙河、她的送快递的男友韩山，以及由此牵连出的一连串的底层人物，包括送快递被汽车撞死的卡卡、主动献身的女大学生鹿茜。徐则臣不动声色地将一群走投无路的人呈现在小说中——和这些底层人物相连的是：雾霾、三轮快遞车、“蚁族”们肮脏的租住房、快递物品、车祸，以及不牢固的爱情等等。这些蛰伏在北京城市底层的景观无疑是整部小说最为“现实”的地方。作家既写出了这些“北漂”底层小人物艰难的生存处境，更写出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焦虑。他们为了能在城市立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鹿茜），还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卡卡），更有因为愤怒而放手一搏乃至酿成悲剧（罗龙河），不得不说，他们的悲惨命运在小说中着实达到了催人泪下的程度。他们因为惨痛的代价而愤怒，又注定因愤怒而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他们是一群因为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走上绝路的人。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们理解了《王城如海》的底层书写所呈现出的困境：如果说此前徐则臣小说表述了走投无路的人们的活的状态，那么《王城如海》则更清晰地将底层人物的宿命暴露无遗，这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们的死的注定。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小说的两条线索放到一起，做一个对照性的阅读，就不难发现，《王城如海》所描绘的北京风物是以余松坡为代表的“暂时成功进城者”和众多“想要进城而不得”的底层小人物这两个阶层组成的。以这两个阶层为核心所讲述的故事巧妙地构成了中国社会内在危机的四

则寓言：乡村衰败的后果勾连着检举别人的快感（余松坡的告密）；谋求上升机会的人只能以自轻自贱的方式生存（鹿茜的献身）；肆无忌惮地抢占资本造就了底层的走投无路（卡卡的死亡）；资源分配的不公最终演变为毫不留情的阶层对立（罗龙河的复仇）。

事实上，无论他们的“进城大战”是否成功，这些人物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无一不是作为异乡人的文化身份而存在，他们都是乡土社会的逃离者与背叛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城如海》通过城乡关系去窥探北京城市的风貌，进而揭示出城市人的生存状态。蛰伏于北京的底层人物，他们宁可忍受着城市的种种弊端（无论是环境的雾霾，还是精神的雾霾），也无怨无悔地希望扎根于此。就连“成功者”余松坡不也同样不愿坦诚面对自己的过去吗？也正因如此，《王城如海》对现实特别是城乡关系的理解止步于表象的暴露，而无法深入到对资本、权力等层面做出反思。它看似在探讨城乡对峙的紧张关系，但总是在紧要关头悄然走笔。无论是对底层苦难命运的思考还是对城市知识分子心灵忏悔的反省，作家的态度都可谓如出一辙。无论是无法忍受城市规则的“蚁族”群体，还是长期有着在国外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心都被现代城市所折磨、压抑，而摆脱这种折磨和压抑的途径，而且是惟一的途径，就是向隐喻着前现代的乡土中国妥协。

不妨说，徐则臣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内心深深的焦虑和不安，却也像每个人一样不知何以如此与怎样不如此。小说基于某种现实，将北京城市的各色人等、器物共同熔铸于一个内在性的趋于崩塌的“紧急时刻”。

（《王城如海》，徐则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沉船》：对时光觉醒性的透视

卢辉

“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刻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当我极力想打捞阿尔丁·翼人的“沉船”之时，我也试着溯流而上，与他，与“承负我们的岁月”相逢在岸边。此时此刻，我才猛然发现“承负我们的岁月”是每个人都回避不了的：从孕育新生的母胎开始，每个人的生命就已经牢牢地植根并寄存于岁月之中了，从生到死，人的一生就是在与各色各样的岁月发生关联——不管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之间的粘连、互摄、摩擦、碰撞或决裂……衍生出与岁月连成一体“的大时空”和“大心境”。那么，《沉船》作为泅渡此岸到彼岸的岁月“殉葬品”和精神“奢侈品”，像这等壮怀激烈的神话般的演绎，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时光的紧迫性与觉醒性的透视与神现，就是为了每一个人在世界中的有限生存提供一个富有存在感、紧迫感、终极感的环境。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阿尔丁·翼人的《沉船》反思的出发点，是站在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基点上：“唯有生命的体验创造奇迹/唯有诞生或死亡，在爱的阴影下/流淌成长长的谣曲/抑或是我们交出的手掌/触击沉默的土地，挥泪如雨”。很显然，感性个体的有限生命如何才能把握住永恒的生命意义的问题从《沉船》的一开篇就上升到首要地位。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的今天，“沉船”诗耐人寻味，他是否率先引证：现代人在把握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的同时，为何把握自我的能力却愈趋衰弱？的确，当我们面临一个普遍技术化的世界，深深感到人的自我失去了实在性，人的意识分裂日益加深，感性个体生活在一个与他格格不久的宇宙之中，特别是每一个人退缩到自我的堡垒中去，却发现自已并不了解自己。正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随着《沉船》的出现，“我”在很大程度上敢于行进在神话和寓言中，却又回避了一种语法虚构，一种语义上的幻影。那个真实的“我”投入到自我来设定生存信念，自我来设定生存价值。于是，时间中的“我”、岁月中的“我”像一只会思想的“船”不停地划桨，不停地迂回，不停地行进。

但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还不能代替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相反，随着工业、技术、信息文明的发展，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反而更为突出。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岁月，就是时间。人作为感性个体，正是由于感到时间的驱迫，生命的短暂，才拼命地追求价值生成：“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往事/凝视很久，却没有逃避的船只/唯有在空旷的原野，在风中/扬起倔强的头颅”。诗人在“承负我们的岁月”中穿越——凝视——扬起。不仅如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承负我们的岁月”，如何理解时间，如何把握时间。时间既然是人的生存的状态性，岁月既然是人的生存的沉积物，那么，敢于打破外在时间，创造出一种内在时间，在

一种迷离、恍惚、模糊的瞬间感受中去把握人生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这是《沉船》留给我们的最大的精神财富。

虽然说岁月、时间、空间是不可剥离的，然而，岁月的“沉积物”持续给我们以时间的觉悟，以空间的唤醒，以生灵的敬畏，以世界的挽留。《沉船》对岁月的终极思考当然不限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简单演绎客观时间与主体的关系，而是对被同化、被淹没的岁月的一种觉醒、一种挽留。在他的诗中，生命的走向，就是时间的走向、岁月的走向。岁月，作为诗人的“内感觉”，阿尔丁·翼人在感性直观、想象范畴和知性触角的构架中打破了“岁月”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客观性划分，创造出一个梦幻般的诗意世界，在诗的世界之中，过去和未来就作为回忆和预感而进入了当下的生存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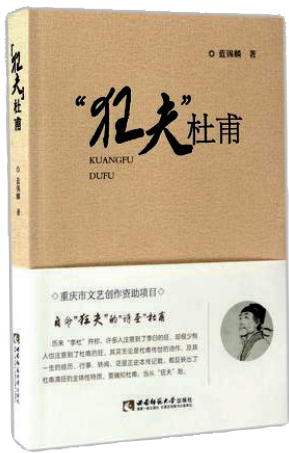
“从彼岸传到此岸/从此岸传到彼岸”，《沉船》试图让岁月在一个永在的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应该说，岁月不仅具有包摄性，同时还具有磁吸性。岁月的这种包摄性和磁吸性是任何东西——不管是人、物体和光——都抗拒不了的。因此，阿尔丁·翼人用诗歌演绎的“岁月”，就不仅仅是与自然实在相关的时间，而是与人的生命及其价值相关的时间，是自身对时间的体验。正是带着这样的诗意探索理念，诗人这样写道：“欢呼吧 我的子民们/是你们拯救了又一个民族的精灵/看到眼前的现实，风风火火/正在化为重天的丽日/我的心已得到片刻的安宁/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在我到来之前面对河流/诉说亿万年前相传的歌谣/而我。早被公众的舆论审判/失去了红嘴唇真理的光焰/迫使自已默认一个时间的概念/为存在而存在”。在其中，人的瞬间体验总是由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充实。所以，现实的每一瞬间都依其在短暂的连续中的地位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时间结构与现实范畴的这一关联使人成为时间的存在和岁月的见证，正是因为诗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或是被唤醒的生活影子）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样才能使读者能领会一般的历史，并为之作出探究的努力。记得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时间提升到一个非同小可的地位。时间性是人的生存、人在世界之中的先验结构，是人的生存的种种状态的地平线。海德格尔的见解有两个突出的地方：其一是强调时间的有限性，也即是强调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个人时间体验的有限性；其二，时间的有限性（有终止）就把感性个体的将来提早暴露出来。《沉船》由“承负我们的岁月”所衍生出的“时间”一再向读者敞开思想：一切由时间而生，一切随时间而去，一切为时间所容，一切为时间所破，一切为时间而歌，一切为时间而语，一切为时间而书，一切的一切为时间而铸。

（《沉船》，阿尔丁·翼人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华

《“狂夫”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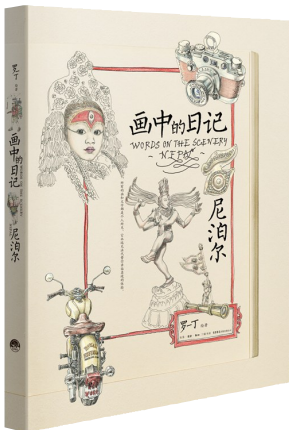


蓝锡麟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出版

本书是重庆市文史馆馆员、作家、学者蓝锡麟为纪念一代诗圣杜甫旅居夔州1250周年而作。作品以杜甫诗句为依托、载体和线索，分别阐释和论述了杜甫其人，包括杜甫的游侠经历、凌云壮志、才华自矜、时事愤激、生存牢骚、诗酒任性、侠骨义气、至性至情、命运反讽、诗美登极等，以及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比较。全书以诗论诗，由诗观人，语言优美而不乏严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术著作的刻板枯燥，呈现出一种“诗美”的学术风格。作者表示，希望自己写出一位更真实的诗人杜甫，打破人们对杜甫形象及其作品的传统定位。

诗，由诗观人，语言优美而不乏严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术著作的刻板枯燥，呈现出一种“诗美”的学术风格。作者表示，希望自己写出一位更真实的诗人杜甫，打破人们对杜甫形象及其作品的传统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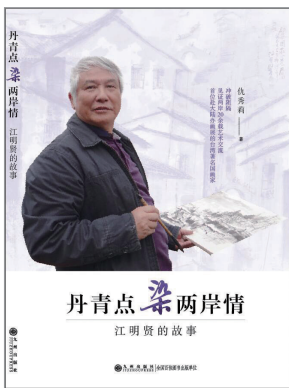
《画中的日记：尼泊尔》



罗一丁 绘著
三联书店
2017年4月出版

湿润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巍峨的雪山群、古老独特的建筑、雅致古朴的艺术、笑容灿烂的人民、风光无限的徒步路线……罗一丁极具个人特色的绘画和步履见闻，描绘了观光客以外、慢游之下的尼泊尔，用《画中的日记：尼泊尔》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这个离我们既近又远的国度。作者说：“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的云中古国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越多了解，越少确认。不过这块山地上壮美的自然和干净的心灵是不需确认的，它们是传导快乐的源泉。在尼泊尔的每一天，快乐都会上升。”

《丹青点染两岸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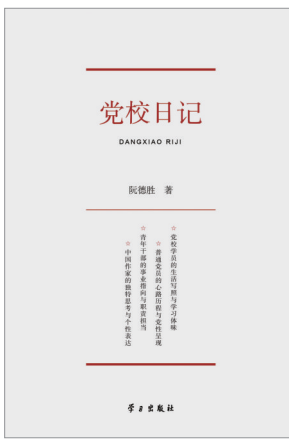


仇秀莉 著
九州出版社
2016年12月出版

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国画家江明贤打破海峡两岸长期的艺术分隔僵局，冲破阻力来到大陆举办个展。此后，他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开展艺术交流，被誉为“行走于海峡两岸艺坛使者”。2011年，他与大陆国画家宋雨桂分别代表两岸主笔合绘“新富春山居图”长卷并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在海峡两岸引起广泛影响。这部报告文学以真切朴实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详尽描述了江明贤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生动鲜活地展现了台湾艺术家力促海峡两岸艺术交流的真挚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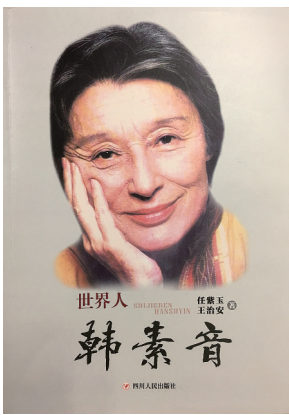
《党校日记》



阮德胜 著
学习出版社
2016年11月出版

《党校日记》是作家阮德胜以参加地方党校青干班学习为主线而写作的日记体作品。作品以优美的文笔、独到的视角、敏捷的洞察、全新的思考，真实地记录了一位党校学员的生活写照与学习体味、普通党员的心路历程与党性呈现、青年干部的事业指向与职责担当、中国作家的独特思考与个性表达。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黄献国认为，时值全党正在开展也必将坚持长久地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能有像《党校日记》这样的作品来阅读，是一种辅导，更是一种推动和提高。

《世界人·韩素音》



任紫玉 王治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11月出版

这部长篇传记文学再现了英籍华裔女作家、社会活动家韩素音坎坷的一生，力求将她的人品与作品完完整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创作该书，作者历时20多年酝酿、采访和搜集素材，除几次采访传主本人、了解她的人生磨难和创作艰辛外，还采访了她身边众多亲友和知悉她情况的人士。